

论《喧哗与骚动》中白痴班吉的美学意义

毛信德 周孝强

摘要:美国南方作家威廉·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1929)中的白痴超越了生理上的疾病,隐喻某种美学和道德意义,这主要表现在白痴班吉爱与道德的疯狂对话中。白痴以隐秘而无法用清晰语言来表述的喃喃呓语诉说着爱与道德的关怀,并给出高于一切价值的精神发现——圣母之爱!

关键词:美学;道德;白痴;圣母之爱

作者简介:毛信德,男,教授。(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23)

周孝强,男,硕士研究生。(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23)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 (2010) 03-0085-04

—

对现代社会来说,它的建构必须从理性最能把握和容易控制的最基本部分开始,因此,创造一个有秩序、标准、可控的同质性社会尤为关键。自启蒙运动以降,理性就采取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或其他手段,来划定边界并谴责处于边界之外的事物,建立同质性社会。当然,本文中的理性并非指那个认知理性和客观科技的基础,而是那个工具化成为伦理基础的理性。正是“这种伦理化的理性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成为可能,整个社会生活服从于异化劳动的律令和积累过程成为现实。”^[1]在普遍和同质性的伦理理性化的社会中,很少有什么东西会发生变化。对于年轻的美利坚来说,同样如此。他通过生产和消费的方式制造同质性社会,将构成美国的全部要素同一化。但有趣的是,现代理性在不断建构同质性社会的同时,在其内部也兴起了一股反理性思潮或怀旧浪漫主义情绪。这种思潮和情绪往往被现代理性归约为非理性。在两者对抗过程中,反映出在原本稳定性就小、变化却过度的美国南方社会,越发容易滑入不稳定与混乱之中,使得“现在”变得更加难以捕捉,变化莫测。

1861年的南北内战印证了在不稳定的南方社会,当下的不可捉摸与混乱。虽然战争产生了同情、自我牺牲与为职责奉献的诸多例子,但他更产生了腐败、普遍的物质主义以及自私等令人讨厌的副产品。19世纪90年代初与20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以及一战加剧了“现在”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有着浓厚农业传统的南方社会,由不确定产生的恐惧与混乱更为明显。对于来到北方的南方人,“他们在北方工业文明中所得到的是心灵的震撼和无比的沮丧,他们无奈地将热情还给过去的田园生活。商业社会没有给他们带来憧憬,他们只能将时光投向回忆和悲壮的往事中去”^[2]。他们大肆赞扬南方的往昔生活并宣扬回归传统,但这种传统道德宣言书在现代化进程中变得苍白脆弱,蜕化为一种怀旧情绪上的浪漫主义——对非生产性消耗的留恋。每个世纪以来,社会的矛盾很容易成为个人的病症。特别是在时代与时代的转换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症状集中体现在南方文艺复兴运动中。艾伦·泰纳在《南方文学的职业》(1935)一文中所指出:“我们处在历史十字路口时所出现的奇异的文化爆发,它多少类似于16世纪末商业英格兰开始摧毁封建英格兰之际的诗歌天才爆发,只不过规模小得多而已”^[3]。这一时期,威廉·福克纳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南方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产物。他的创作和思想深受浪漫主义、清教意识、南方神话及其独特文化的影响。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是对已逝南方

文化的怀恋,对南方人生存的痛苦与不幸做了深刻而明确的描述。

《喧嚣与骚动》中康普生家族就是南方社会的缩影,真实地呈现出美国南方社会的历史变迁。小说通过康普生家三个儿子以及黑佣迪尔西的视角,令人信服地揭开了康普生贵族世家与一家三代人的遭遇和精神状态,透露出一个弥漫虚无主义精神氛围和悲观情绪的时代。书名出自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第五幕第五场麦克白的台词:“人生是一个白痴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嚣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4],毫厘不差地印证了时代精神状况——价值与存在上的虚无主义。在福克纳看来,以正常的人视角是说不清道不明这个世界的本质,那就让一个“白痴”来说吧。福克纳在1956年接受吉恩·斯泰因的采访时,对小说的构思做了解释:“我先从一个白痴孩子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的由一个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人讲出来可以更加动人。”^{[5](262)}本质上,《喧嚣与骚动》就是关于白痴及白痴所讲的故事。

二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指出,从古典时期以来,疯癫(包括白痴)被排斥在理性之外,并被理性话语所规训与惩罚。在理性范围之外进行探索的一切事物,被认为是既无规则也无标准,既无结构也无秩序,既无意义也不可控的。由此,疯癫被划分为无序、混乱的自然本性上的一种现象,被现代科学归入一个独立的生物学事实。福柯批判了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提出疯癫是由理性“虚构”一种社会关系产物。疯癫不能以生理上的精神疾病一言以蔽之,也不能以自然本性上的现象作简约粗暴地划分,而从一个意义世界(宗教、美学、道德、文学等)出发考察疯癫的成因及隐喻。现代科学有关对疯子、白痴不洁、肮脏、邪恶的定义都是相对的。因为物体从来不会是本身就不洁、肮脏或邪恶,它们只有在一个社会和精神所确定的范围内违背了文化所特有的特征时,才变得不洁、肮脏和邪恶。正如白痴在众人的眼中,就是一个精神上的麻风病人,人们对麻风病人的偏见与措施原原本本地移植到白痴身上。《喧嚣与骚动》中的白痴班吉就被无情地赋予了一种肮脏、危险和骚扰的意象。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白痴成为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扰的生活常态,一种被社会危害多于危害社会的日常经验。值得注意的是,白痴往往是一种社会历史演化的效果,这种演化的效果往往将白痴的表达从生理领域转移到心理领域,从自然领域过渡到社会领域。白痴讲的故事是毫无意义的,但如若对白痴进行一番考察,则不难发现文学史中许多白痴往往能通过一种长期、巨大和理智错乱行为把自己变成预言者,石破天惊地道破存在的本质。班吉的白痴症状是南方社会的矛盾在人身上的表现,在他身上凸显了十足的混乱与天启的模棱两可的性质。班吉以“预言者”自居,用毫无理性、隐秘而无法用清晰的语言来表述的喃喃呓语,道破了存在的痛苦。

福克纳在《喧嚣与骚动》中,以白痴叙述作为开场白,不仅是一种叙事策略,阐明“人生是一个白痴所讲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进行深层次的美学探索。福克纳在“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塑造的以班吉为代表的痴呆型叙述者,代表了福克纳看世界的一种独特审美方式。美国左派文艺评论家欧文·豪评论道:“班吉浮想联翩所带来的迷惑使读者的反应更加敏锐,迫使读者去捕捉线索,进行比较和做出预见。因此,班吉的部分读起来,更接近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作者从全能角度叙述的故事,更具客观性。”^[6]在小说中,班吉以“透视”的视角直观、清晰、多维的展示康普生家庭形形色色的生活画面,完全的朴实、自然,没有任何虚构,也没有任何理性分析,真实直观地反映出康普生家庭的生活状况。为作者以外的读者提供了审视人类生活的新视角,可以让我们透过“他者”(白痴)的眼光凝视域外世界,体验人类生活的别样形态,促使我们由对痴人的特别关注而开始重新审视自我的内在性和整体性以及思考人类所处的境况。

小说的第一部分完全是通过白痴班吉的眼光来透视周遭世界。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福克纳笔下的白痴与福柯所描述的疯癫在精神上具有同一性:都是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是一种文明的产物。白痴同疯癫一样,可以看成是高超感受力的标志、能够显示超凡脱俗的情感和愤世嫉俗的不满情绪。在

现代社会中，白痴代表了“一种他者（other）行为”，“一种他者言语”^[7]。白痴班吉出场时已三十三岁，却只有相当于三岁儿童的智商。他没有思维能力，也分不清时间的次序，未来的神秘与过去的神秘都集置于“现在”。在他混杂的感官印象中，“现在”是一条永远移动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不稳定界限。然而班吉却对“现在”的异己感和压迫有着异于常人的感官触觉。班吉口不能言，除了哭泣，只能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但他却能“闻到耀眼的冷的气味”，能嗅到姐姐凯蒂“身上一股树叶的香气”^[8]。可见，班吉的白痴更多的是情感上的疾病。这种情感的疾病往往表现在故事的主角往往停留在儿童时代。福克纳把班吉的智商设置在儿童时代，无疑具有一定美学考量和道德意义，即用拒绝离开儿童时代来抵抗资本主义家长式社会关系的进攻。

在白痴班吉身上，福克纳的美学探索也可延伸到巴赫金曾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小说提出的“双重人格”中。首先，白痴的作用在于能为班吉提供能够自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形式，使班吉得以摆脱理性的场域，上升到非理性的高度，透视纷繁复杂的社会；其次，白痴这一面具掩盖下的“预言者”是班吉的第二重身份，这一身份最吸引我们的是——人之非理性的喃喃呓语！然而，不同于巴赫金“双重人格”的是：班吉的“双重人格”并非矛盾人格，更非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的“人格分裂”。班吉的行为并不是来自固定的身份——白痴，而是像演员一样，在白痴和“预言者”之间进行不断“表演”。换言之，班吉的“双重人格”是同一的，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且具有清晰的“隐显”分层结构：白痴为表象人格；“预言者”为本质人格。白痴这一符号是班吉的话语策源地，同时也是班吉逃避现代理性的栖居地。班吉用非理性（白痴）的话语刺破现代理性的神话；“预言者”则在此基础上宣告并试图构建一个完全不同于现代理性的新型理性——没有暴力和无条件的爱——“圣母之爱”。这种爱的话语源于隐藏在白痴背后的“预言者”那里。

三

对以福克纳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而言，“它渴求在社会世界上获得那种已经不复存在的预言家的地位或神圣的地位”^[9]。福克纳一方面用意识流的形式把内容撕成碎片，打破整体性；另一方面他又以“神话模式”企图重构过去的风格与形态。在小说中，三、一、四章的标题分别为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至八日，这三天恰好是基督受难日到复活节。第二章的一九一零年六月二日在那一年又正好是基督圣体节的第八天。不仅标题如此，从每一章的内容里都隐约可以感受班吉与《圣经》中基督的遭遇相呼应。福克纳显然以班吉隐喻基督，在白痴、阉割与“受难”之间形成一种更紧密的关联，赋予白痴与阉割更多的基督教道德意义。但上述这种原始话语对立感的观念并没有在美学与时间上构成约束，形成明显的局限。福克纳在小说中制造班吉被阉割这一象征性情节，证实了神话在阉割情结世界中的存在。一方面，福克纳通过班吉被去势的情结，传达了暴力与仇恨以及由此产生的恐惧，点名世界犹如被阉割的班吉不可能再有生殖力；另一方面，阉割再现了基督式的受难，通过受难撒播基督的仁慈、宽容与神圣的爱。在阉割情结中，存在一种困境与希望：世俗的冲突与神圣之爱的混杂。当救赎者与被救赎者之间产生一个失落的环节——“爱的遗忘”，在世俗领域则会滋生种种冲突、暴力与罪恶。班吉就是这一残缺“生育制度”上的牺牲品。

从疾病隐喻的角度分析，班吉的痴呆是一种时代的症候，他以歇斯底里地“哼哼唧唧”反应出对爱的膜拜。而家庭与社会对爱的冷漠与压迫，则引发、加重了痴呆。康普生太太精神抑郁，无病呻吟，拖累、折磨着全家人。她完全不具有作为母亲的温情，家中没有一个人可从她那里得到爱与温暖。姐姐凯蒂对班吉的关怀也随着这位南方淑女的堕落而丧失。在这个亲情淡薄的家庭，班吉白痴的“症状不是别的，而是爱的力量变相的显现；所有的疾病都只不过是变相的爱”^[10]。柏拉图和尼采看到，世界的本质是混乱、虚无和痛苦。面对这一绝对偶然，人该如何活下去？柏拉图和尼采对世人说，人应该爱他自身，道出了“爱欲”的谎言和“沉醉”的玩笑。而福克纳则从幽暗的深处释放“爱”的呢喃。福克纳塑造班吉的目的就是要穿越自我狭小的空间，达到爱的行动与对象之间、救赎者与被救赎者之间

的同一。这种爱已经脱离自我的局限,扩展到天地、神、宇宙,进而达至完美。

劳伦斯·爱德华·宝林认为:“爱是所有福克纳伟大作品的中心主题。福克纳的许多作品表现了爱之缺乏和爱之反常”^[11]。的确,福克纳一直关注爱与同情这对人类情感的永恒主题。在1950年诺贝尔获奖演说中,福克纳说盈溢作家心灵的普遍真理应该是:“爱、荣誉、怜悯、自豪、同情和牺牲——最为糟糕的是没有怜悯与同情”^[12]。当被问及在塑造班吉这个形象时的内心感受时,福克纳说到:“塑造班吉这个人物时,我只能对人类感到悲哀,感到可怜。”^{[5](262)}可见,在班吉身上集中体现了福克纳对人类普遍境遇的思考。白痴班吉没有理智和判断能力,但并不缺乏对爱的直觉感官。在家庭中,他虽得到父亲和哥哥昆丁一定程度的关爱,却缺乏母爱,而一个家庭至关重要的却是母爱,父亲与哥哥的早逝以及母爱的缺失是班吉悲剧的原因所在。姐姐凯蒂给班吉的爱,实际是一种变相的母爱。然而随着凯蒂的堕落,这种爱也丧失了。在对有关班吉爱的缺失或爱的反常的思考,可以引入亨利·亚当斯的两种象征——圣母和发电机。圣母的概念既是指圣母马利亚,同时也把女人看作是给予生命和延续生命的力量。发电机的概念指的是“工具理性”的统治,有破坏文化的力量。圣母提供一种统一的感觉、一种有着共同目标的感觉;相反,发电机是现代世界的主宰,它使用工具理性,把我们带离人类的范畴,改变人类的前景。圣母集中表现为爱,发电机代表“工具理性”,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

对人类而言,生命只有栖居在爱的领域才是完整的。爱能消除一切隔阂,抚慰一切创伤。班吉的倾诉特别能让人感受爱的重要性。然而“工具理性”统治的同质社会不可避免地磨灭了人类最原始经验——爱,使爱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班吉仿佛是一块试金石,检验着人类身上还残存多少爱。他吁求的不再是一个仅仅被爱而不会爱的被动者,而是爱本身。他所追求爱并不是古希腊自下而上的自然欲望之爱,更不是基于怨恨的市民道德的爱,而是圣母之爱,这种爱“指向的是每个人精神位格的平等,它并不取消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中的等级差异与竞争”^[13]。随着对班吉的进一步描写,作者把班吉这种渴望对爱的倾诉与对爱的寻找扩大到整个人类的普遍感受上,成为人类集体的经验,因为由爱的失落引起的哀伤亘古以来就存在于时空之中。福克纳认为班吉的倾诉来自失去爱的痛苦心灵,“可他还是慢腾腾地、可怜巴巴地干嚎着,那真是世界上所有无言的痛苦中最最严肃、最最绝望的声音了。”^{[8](345)}班吉对失去爱的痛苦“嚎叫”,是对冷漠和基于怨恨的市民道德的愤怒抗议,是对找寻圣母之爱的真挚渴望。福克纳笔下的白痴就是人类对自我的内在性和整体性的求索真实反映,即使它还没有定型,但仍能激起人们对人类普遍境遇的思考。

参考文献:

- [1] Ju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87. 214.
- [2] 施袁喜编译. 美国文化简史: 19—20 世纪美国转折时期的巨变 [M]. 北京: 中编译出版社, 2006: 79.
- [3] 毛信德. 美国小说发展史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 319.
- [4] 莎士比亚全集 [M]. 朱生豪,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387.
- [5] 李文俊主编. 福克纳评论集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 [6] 李文俊. 福克纳评传 [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49.
- [7] 刘北成编著. 福柯思想肖像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78.
- [8] 威廉·福克纳. 喧哗与骚动 [M]. 李文俊,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6-7.
- [9]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时间的种子 [M]. 王逢振, 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7: 93.
- [1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M]. 程巍,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20.
- [11] Bowling Lawrence Edward, William Faulkner: the importance of love in William Faulkner Four Decades of criticism, ed. Linda Welshimer Wagner,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3: 110.
- [12] 李文俊. 福克纳传 [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3: 153-154.
- [13] 余虹. 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90-91.